

韩毓海·著

〔增订本〕

# 五百年來誰著史

Who made the history of past 500 years

## 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



本书第一部于2009年冬，在“世界史学”与“现代史学交叉学科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史‘世界史观’与‘本土观’”会议上正式出版。

“世界的‘中国观’”的提出，源自明中叶前后的历史事件。但及至19世纪末叶，即1904年，署名“读者”的16位知识分子，在《民权报》撰文认为，这一时期是“世界历史”成型的时期。但究竟何年何月何日何人，在时间上并无共识。另一位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利玛窦，他约公元1600—1680年间，将西方“漫长的16世纪”，划分为第三时期，即“世界历史”的开端。利玛窦原曾计划由“耶稣会”出“各书”，他约1683年，以“耶稣会”的名义，在罗马出版了《中国书》——《利玛窦中国书》。这是利玛窦在1683年完成其著作的著作中——《利玛窦中国书》和《利玛窦中国书》。

但就其本书而言，这一时期，其意义并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其背后的“世界史观”与“本土观”的矛盾。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

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

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

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

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

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

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

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

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

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书》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开端。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韩毓海·著

# 五百年來誰著史

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

〔增訂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百年来谁著史: 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 / 韩毓海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0.9 (2010.9重印)  
ISBN 978-7-5108-0591-2

I. ①五… II. ①韩… III. ①中国—古代史—研究—明清时代 IV. ①K2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4348 号

## 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

---

作 者 韩毓海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http://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mailto: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20毫米 16开  
印 张 24.5  
字 数 370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9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591-2  
定 价 39.80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目 录

增订版自序 .....	001
绪 言 .....	007
上篇：“漫长的 16 世纪” .....	025
导 语 .....	027
第一节 “无发展的增长”与“科学发展” .....	033
第二节 历史与迷信 .....	060
第三节 “当中国称霸海洋” .....	099
第四节 回首射雕时，万里暮云平 .....	124
第五节 “隆庆元年”(1567)，世界史的大转折 .....	138
第六节 重写《甲申三百年祭》 .....	161
第七节 黄仁宇为什么要讲毛泽东的好话 .....	176
第八节 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 .....	199
小 结 “中国道路”与世界史问题 .....	211
下篇：“漫长的 19 世纪” .....	227
导 语 .....	229
第一节 重新思考 19 世纪 .....	233
第二节 中国为什么被打败？ .....	256
第三节 国债与资本 .....	275
第四节 从康德到列宁 .....	301
第五节 作为“中国方法”的《大同书》 .....	335
第六节 “出乎意料”的现代性及其后果 .....	363

## 增订版自序

借此机会，我首先要向尊敬的读者说明一下增订版所作的修改：篇目本身未作丝毫的更动，但每节几乎都增加了新的资料，目的是使增订版的观点更加鲜明丰富。至于语句和修辞上的改动，则无法一一列举出来，或许，对于“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从业者而言，写出为自己满意的文字几乎是不可能之事，这也意味着语言的推敲永远是未竟之业。

早在年初的时候，我就接到通知说，《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第一版已经全部卖完了，而增订版马上就要付印，就我个人的意见而言，第一版的某些部分需要作更为彻底的修改，但是，现实的压力使我没有时间这样做。因为半年多来，我一直在为第二卷（《龙兴：1500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与革命》）而努力工作，这也就是本学期我在北京大学所开课程的内容，这门课需要阅读大量的历史文献：《商君书》、《盐铁论》、《封建论》、《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陈六事疏》、《备陈民间疾苦疏》、《统筹全局疏》、《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国之命运》、《〈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和《论联合政府》，当这些血与火的文字一一重现的时候，我深知：我们筚路蓝缕的先驱，精神的父亲，是他们以思想和实践铸就的不朽华章，点燃了后来者的心灵和眼睛。

“一篇读罢头飞雪”，时间倏忽而去。当《毕业歌》声响起，新的暑期即将到来时，同学们告诉我说：正是一个学期的阅读，使大家真正理解了《毕业歌》里那些著名词句的意义：“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

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樑。我們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五百年來誰著史》在尊敬的前輩和同仁、在廣大讀者中迅速得到理解，既是我勞動的最好報酬，更是一個初學者最真誠無私的鼓勵。中華民族江山有思，我知道：是那些肩負着天下興亡大業的實踐者、勞動者們，成就了百年燕園中的“弦歌一堂”，我深信：“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同時“觀其中國家百姓之利”，即從歷史中、從實踐中、從國家人民的利益中去找尋知識的依據，“從無字句處讀書”，這就是北京大學真正的光榮傳統。

卡爾·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曾經說：“以貨幣形式為完成形態的價值形式，是極其無內容和極其簡單的。然而，兩千多年來人類智慧對這種形式進行探討的努力，並未得到什麼結果，而對更有內容和更複雜的形式的分析，卻至少已經接近成功。”<sup>①</sup>亦如本書第一版緒言中所交待的那樣：正是在紐約親眼目睹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的經歷，方才使我讀懂了《資本論》作者的教誨：一個將“虛擬經濟”置於生產和市場交換（“實體經濟”）之上的資本主義體制，何以是一個“頭足倒置”的危機結構。同樣的，正是由於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實踐，已將中國與世界深深地嵌入為一體，方才為我們當前的思考提出了新的使命和 requirement：這就是要求我們的思考必須始終具備廣闊的世界歷史視野；我們深知：使《資本論》、《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等理論文獻成為當代中國認識世界之教科書的，並非基於單純的理論或思想史的緣由，而是基於現實實踐的要求和願望，如果沒有社會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所提供的深刻“常識”，我們就無法辨別高深莫測的理論和知識的真偽與高下。“然而馬克思主義看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為它能夠指導行動。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並不實行，那末，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理論的認識，還必須再回到實踐去。”<sup>②</sup>歷史已經證明：離開了這一明快的道理，離開了這一正直的求學、求知道路，學院里的知識和理論研究就將迷失方向。

<sup>①</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版·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8頁。

<sup>②</sup> 毛澤東：《實踐論》，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2頁。



1954年，毛主席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曾经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这意味着：只有了解自己的前人走过的道路，只有了解我们前人的事业，才能更为深刻地了解我们今天的任务和使命。

如果尝试着将漫长的中国政治史分为四个时期，那么从春秋战国到秦的郡县制统一可以称为第一个时期，而其中又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郡县制之设立，标志着中国政治文明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中国政治思想，兴起于秦晋之间，成就于墨法之道，而在诸子百家中，墨家兼爱、尚贤、尚同的政治思想，对近代以来的革命者影响巨大，而其践行禹道，摩顶放踵，以自苦为乐，“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政治伦理，尤其值得我们珍惜。同时，《商君书》则指出：所谓政治，就是指那种通过经济、军事和法律手段组织人民的根本力量，这一论断开辟了富国强兵的康庄大道，而离开了秦所发明的户籍—郡县制度，一切政治实践亦将因丧失基本抓手而无从谈起。毛主席《读〈封建论〉·呈郭老》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至于墨家艰苦奋斗的实践精神，《庄子·天下》篇则论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觫，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今日再思此语，怎能不令人感慨万千！

从汉至唐，可谓中国政治史的第二期，其基本脉络则是贵族制度的消灭，国家官僚制（科举制）的实行。这其中既有内部旷日持久的艰辛改革推动（九品官人法与中正制的纠葛，即体现了改革的复杂性），亦有北周、隋、唐携北国刚健雄风之革命冲击，而继秦之户籍—郡县制度之后，统一的国家考试制度之实行，再为中国政治奠定一层深厚根基，中华民族藉此方走向光辉灿烂之盛唐。

北宋以降，中国在上世界上率先走向“近世”，举凡交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之“近世化”，于宫崎市定教授的名篇《东洋的近世》中均有深刻之论述，至于工业技术方面，以焦炭冶铁之法，中国更是早于英国工业革命600年而成熟，此一点尤其具有世界史意义<sup>①</sup>。而所谓千古之谜者，则为率先走向近世之中国文明，何以此后竟600年徘徊不前，反而终在1840年之后，为现代西洋帝国主义势力所一举击溃。而我以为这便是政治史、思想史研究

<sup>①</sup> 宫崎市定：《宋代的煤与铁》，见《宫崎市定论文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92页。

最为要害之课题。

实际上，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已经深刻论述过：宋以降，学术与政治的分离、文治与武功的分离、官与吏的分离（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乃是导致政治组织能力下降、国家能力下降的根源所在。其中官与吏的分离，更是贵族制、中正制和役法弊端的遗存和发展，它导致了基层的财政、司法和税收乃至军事，均操纵于胥吏之手，胥吏、豪民和生员沆瀣一气，把持基层和地方，遂酿成国家权力无法深入其中，而所谓“理政”，至此步履艰难；同时，由于官僚队伍中埋藏着一支庞大的非正式的行政大军，国家便不得不听任“火耗”、“陋规”和“浮征”的存在，财政和税收的统一再也无法实现，于是“理财”亦从此变为了空谈。

何况，率先进入近世的中国，生产发展、市场扩大与货币短缺之固有矛盾，竟长期不能得到解决，于是，除用于促进农业革命之外，中国更将铁的大量生产以及冶铁技术，用于铸铁钱及以“浸铜法”铸铜钱，货币的大量增加，固然促进了中国的“商业革命”（明代即有“十大商邦”之兴起与壮大），但也正是因此，与其后英国将焦炭冶铁技术投入制造机器，并以此推动制造业和军事工业发展不同，中国冶铁技术的发展，尽管极大地推动了其“农业革命”特别是“商业革命”，但却没有发生出“工业革命”，而这也使得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分离，使得商业资本支配国家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与障碍（宫崎市定、陶希圣）。进而言之，造成这一瓶颈之根源，更在中国没有以成功发行国家主权货币，而完成金融革命，并得以藉此闯过生产、市场扩大与货币短缺这道矛盾难关。而国家货币不能发行，金融革命无法完成，根源又在政治上的官吏二分体制，王安石即痛感基层全为胥吏、豪民所把持，国家金融力量无法深入农村，到明隆庆元年（1567）之后，国家干脆通过进口美洲白银来解决货币短缺问题，即从而将货币问题之解决，委之于海外和国内豪商。于是，中国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便不可避免，胥吏、豪商、外国资本支配中国的命运亦就不可避免了。

“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国政治史的第四期，揭开了中国改革与革命的新时代，揭开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最基层的农村入手，通过深入群众、组织群众的制度创新，重建了与劳动人民血肉相联的、牢固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并于新中国诞生的前夜——1948年12月31日，成功地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国家主



权货币“人民币”。此后30年，新中国方才以此现代政治、经济和财政制度创新为强大动力，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举完成了工业革命。改革开放以来，正是中国庞大的产业、生产能力，驱动了世界贸易和商业革命的日新月异。有人说：中国用30年的时间解决了“挨打”的问题，又用30年时间解决了“挨饿”的问题，这种说法是形象的；而今天的我们，正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在这条继往开来的道路上，我们深知：遭遇各种艰难险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应该虚怀若谷地接受一切科学的批评意见，接受世界上一切友好人士的善良建议，但是，对于那些“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们还是要理直气壮地以马克思曾经引用过的佛罗伦萨人的格言作答：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60多年前，陈寅恪先生曾经用“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来颂扬宋明儒学的发生之于中国历史的划时代意义，而笔者学识浅陋，至今难以理解他的这番高论之陈意所在。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百姓如我者，同样是60多年前，一位伟大的中国人，在黄土高坡的低矮窑洞里所说的话，却如悠远的雷声，时刻警醒着我们，告诉我们何谓佛陀、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支配历史的“大事因缘”：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了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的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两个神仙下凡，把这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

众。全国人民一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sup>①</sup>

外国人一向有把自己的作品献给至亲好友的惯例，如此，我则愿诚挚地将自己幼稚的工作，奉献给养育我的父母人民，特别是：奉献给激发我写下本书第一行文字的山西那遍地英雄的山河，奉献给在这块土地上默默牺牲和奉献着的父老亲人。因为——正是那些在历史的纵深处和现实的实践中奋力工作的人，使得我幼稚的写作成为了一个声音。

2010年7月10日暴雨后，写于北京

---

<sup>①</sup> 毛泽东：《愚公移山》，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2页。

## 绪 言

### 一

2008年9月，我在美国纽约大学教书，学校与华尔街之间徒步不过20分钟，教学之余，正好就近观察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金融大危机。那个时候写了《反面教材的价值》这篇文章，以英文发表之后，国内的几家学术刊物也想刊出汉语稿。记得高超群教授为了索要这个文章，曾深夜从北京把电话打到了纽约，求“稿”若渴之心，令我深深感动。最后，这个文章很迅速地在《绿叶》、《世界博览》杂志刊出（这要感谢杨学军先生和阎海东先生），随之又被几家报刊转载，反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意外之余，我也由此体会到当今的中国是如此夜以继日、密切地注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而自己深以为幸的更是：作为一个货币金融领域里的外行，一点有限的阅读和观察体会，远隔千山万水，竟也能够对于国家和老百姓有些许轻微的意义。

从中国的视野、或“以中国为本位”去观察和描述最近500年世界历史的变迁，致力于探询当代中国的“世界”观，这是我最近这些年来学术工作努力的方向。但是，说老实话，这也仅仅是“努力的方向”而已。我自己读书不多，尤其不是历史系科班出身，所以这个探询的过程，其实完全就是学习的过程。

最近500年来，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欧美霸权的形成并横扫世界；二是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华民族，由逐渐衰落而再次走向伟大复兴。有人把这段历史归结为资本主义的胜利，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首先，究竟什么才是“资本主义”，学术界可以称之为“正宗”的意见，起码就

有三派，至于其他的纷纭众说，更不必再提了。而三派主流意见中，一种将资本主义归结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革，特别是大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关系的奠定（卡尔·马克思）；一种着重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明，说白了就是把做生意等于念经，把积累资本视为积累功德（马克斯·韦伯）；第三种则侧重于自然经济向金融经济的蜕变和飞跃（费尔南·布罗代尔）。用这三个流派来解释什么是资本主义，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用它们来解释西方之所以兴起，中国之所以衰落，解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我看来，则起码是没有抓住历史要害，而且也不尽符合历史的事实。

我认为：最简捷地解释这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实际上就在于“国家能力”这一点上。在西方现代兴衰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的奠定，最初就是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银行家们投资于国家间的战争，最终则是金融家通过攫取“世界货币”的发钞权，而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为他们的投资冒险埋单和作担保（这随着1913年美联储体制的形成而达到高峰），而上述军事-金融-国家相结合的特殊组织形式，才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真正关键，至于那被奉若神明、而又众说纷纭的“资本主义”，充其量只不过是不同历史时期充当了“帮手”的角色而已。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目标在于占有更大的“生存空间”，金融家的根本目标则在于通过债务关系攫取最大利润，至于是否采用上述三种“资本主义”方式，那完全要看是否有利于这两个根本目标之达成而定。

考察中国500年兴衰的关键，其实又在于经济的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下降这个矛盾现象。经济发达的宋，反而打不过立足于军事组织的辽、金、西夏部落，这里的关键并不在经济，而在社会组织能力。由皇权直接来面对基层马铃薯一般无组织的小农，这样的国家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组织效率可言，唐以降，基层财政、税收、司法渐与正式之国家行政相脱离，而为民间“胥吏”阶级所掌握，此即“役法”之大弊；而宋代以来的政策，又是将组织社会的任务一概交由商人和地方土豪，国家更从商业、运输乃至军需供应中全盘退出，国家取“无为”和“不干涉主义”，而这就是“开中法”的弊端。不但基层没有组织，而且上层的货币财政也十分混乱，货币短缺、“多币制”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到了明隆庆元年（1567）之后，反而将货币出路委之于进口美洲白银，这又是财政货币政策的最大失败。而对外，所谓的“天下秩序”，于周边藩邦采取的一向是文化治理的“朝贡”方式，完全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存空间”、

“地缘政治”意识，如此组织能力松散的帝国，无论它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发展经济，能够或者不能够发生“资本主义萌芽”，而一旦遭遇现代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之打击，其涣然瓦解却是必然的。而国家既然已经瓦解，至于发展什么“主义”才好，自然也都统统变成空谈了。

所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肇始于中国革命以建立基层组织的方式，由发动群众、教育群众而组织群众，极大提高了社会组织能力和国家效率，然后，国家才能把社会剩余有组织地投资于长期发展方面，如此才有合格的国家财政，在此基础上方有国家发行货币之主权，而对外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及其胜利，更是实实在在地打出了一片地缘政治的新格局，这种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之密切结合，靠的是无数革命前辈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如此才谈得上今天的“伟大复兴”；而至于是否采用资本主义这副灵丹妙药来谋发展，那完全也要以是否有利于社会组织强大均衡、是否有利于国家能力持续增长，是否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而定，即那充其量是末而不是本，是术而不是道，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实际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昭示的乃是完全不同的真理，中国的复兴走的乃是完全不同的道路，而这个真理、这个道路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已经为历史所证实。

研究中国历史，上要看货币财政，下要看基层组织，同时更要能以世界大势之变迁、联系和互动为背景去展开思考，如此，方能有所收获。在严肃的历史问题面前，任何轻薄的态度、任何教条主义的盲从都是必须杜绝的。而唯一值得自我宽慰的是，上述浅见，并不是盲从得到，而是从自己的读书、思考和摸索中得来的。几年来，就这样一边读书，一边思考，逐渐积累了一点笔记、一系列的问题，不过时间一长，反而倒是更没有把这些学习体会写出来的勇气了，有些思考和提出的问题，自然也就随时光流失，逐渐淡忘了。

真正的写作机缘来自赴美前学校的一次安排，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蒋朗朗教授派我去山西作一个学术讲座。由于参加讲座者都来自基层，以从事财政和税务工作的同志为主，既是学校的任务，于我自然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这就迫使我不能不紧急准备一个初步的讲稿，这样几天下来突击了几万字的稿子，由于对讲稿没有信心，所以还带了不少参考书到山西。我本是个过于认真又不堪大任的人，这次面对的又是上千人基层干部的大课堂，讲座结束后，竟然病倒在那里，反倒是给山西的同志（特别是曾被授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的李晋芳同志）添了不少麻烦。但是，期间参观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以及

抗战最艰苦时期建立的八路军总部（虽曰“总部”，实际上不过农舍三小间而已）的经历，对我触动非常之大，应该感谢这次较长期地面对基层的机遇，它使我近距离地感受到：我们的前人是如此的舍生取义，我们的百姓是如此的不屈不挠，绝大多数在基层工作者是如此的勤劳俭朴，中国历史的展开是如此的筚路蓝缕、波澜壮阔，中国改革和中国革命的大业，确是由生活在最基层的老百姓苦苦支撑起来的，这真是“作始也简，其成也巨”！

太行山里本来也没有什么书可读，躺在宾馆养病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自己在讲座前许多没有想清楚的事情，竟然想清楚了一些，这突如其来大病，因此可以算是进益的一个机缘，在这样一个机缘之后，我领会了一些以前不甚领会的书上的语句，尤其包括历史上的改革与革命。

## 二

中国改革与革命是近代落后的结果，革命当然不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原因。而对于“中国近代何以落伍”这个大题目，则大致又有几种回答：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全球扩张所致；其二，则是一般地、抽象地将其归之于中国在制度、技术乃至文化上的落后弊端，以及西欧的先天优势（以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最有代表性）；而我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以“天下”和“世界”为担当的文明，资本主义则是自1500年以来从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以金融和军事技术为核心，向世界扩张的体系。这两种有深刻历史传统的组织形式，在500年历史间漫长的“互动”、博弈，才构成了我们解释500年来世界大势和中国“天下兴亡”的关键。从这个角度说，那些构成中国近代衰落的因素，往往又曾是支持中国长期繁荣的因素，这正如我们文明中国有亟须变革的弊端，但其中却同时也蕴涵着近代改革与革命以及中国现代复兴的种子。只有了解中国文明形成的长期性、历史性、复杂性，同时又了解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历史性和复杂性，而不是抽象地将问题归之于“制度”和“体制”而简单地打发掉，我们才能对于上述重大历史课题作出真正有意义的探究。

将中国的近代衰落简单、抽象地归之于“专制制度”，特别是所谓“国无宪法”、“民无权利”，这其实是晚清和民初就有的议论，它终究要流于一种耳食之谈，沦为与历史和现实实践脱离太远的空洞教条。对其浅陋机械，前人已

多有讥评。如钱穆就曾说：“谈者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然民权之表达亦各有其方式及机构，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此即立国之大宪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国自秦以来，既为一广土众民之大邦，如欧西近代所行之民选代议士制度，乃为吾先民所弗能操纵。然诚使国家能历年举行考试，平均选拔各地优秀平民，使得有参政之机会；又立一客观的服务成绩规程，以为官位进退之准则，则下情上达，本非无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权宪法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固有效矣。若遂认此为中国历史真相，谓自秦以来，中国惟有专制黑暗，若谓‘民无权，国无法’者已两千年之久，则显为不实之谈。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终以不切国情，一时未能切实推行。而历古相传‘考试’与‘铨选’之制度，为维持政府之两大骨干者，乃亦随专制黑暗之恶名而俱灭。于是一切官场之腐败混乱，胥乘而起，至今为厉。此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所应食之恶果也。”<sup>①</sup>

中国当然不是从来没有制度。自上古以来，就有以黄帝为代表的“血缘世系”以及以尧舜为代表的“名分世系”二者并存，就前一个世系而言，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贵族血缘承继；就后一个世系而言，权力始终是向平民开放的，这就是所谓：“人人皆可为尧舜”。而这里的“平民”，更不专指士、士族、士大夫，也包括士农工商各阶层——特别是包括少数民族。太宗李世民以少数民族血统者，太祖朱元璋以贫苦农民可以作皇帝，其合法性就来自于尧舜的名分世系。这两个世系的互动沿革，就是所谓“多元一体”的制度基础。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去，倡导“天下为公”，不断向平民、向少数民族开放权力的尧舜世系、尧舜体制，是比导致罗马帝国迅速崩溃、贵族院垄断权力的“宪政”更合理、更进步、更能经受历史考验的制度，这已经为中国的长期统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所证实。

作为最后一个汉家王朝，明朝无疑处于中国制度的重要转折期，从体制的上层看，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它是历史上皇权与士大夫阶级冲突最激烈的王朝。太祖洪武十三年，废除了自秦以来辅佐天子处理国政的相位，这成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极大变动。从此天子直接面对六部，六部有建议权，而天子则独揽决策权，另设内阁大学士，为天子襄理文墨，但内阁大学士没有建议权，为了避免皇帝与六部之间发生直接冲突，遂设司礼监居中传递协调——如此多头、侧

<sup>①</sup>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16页。



面之管理体制，自然使得行政上彼此之掣肘成为不可避免；世宗、穆宗和神宗在位期间，皇权与六部之间的冲突，终于达到不可化解的僵持阶段，竟造成这三任皇帝几乎不见六部官员的局面。此后，作为皇帝代言人的内阁大学士和司礼监，与士大夫的代言人六部之间的冲突更是日益加剧、不可协调。而从基层看，胥吏、豪民和生员结合为一体，甚至成为一“虽未掌握武装，但已掌握钱粮”的空前势力。明末置天下饥荒于不顾而放手聚敛的，就是这个全面控制基层的利益集团。可见，皇权与官僚体制之间的激烈冲突和矛盾的不可化解，上层与基层的全盘脱节，造成了明代中期以来国家行政效率、国家组织效率的迅速衰败。

而这一时期，恰恰又是世界史的大变革时期，因为一个银行家、战争和国家密切结合的军商合一、军政合一、资本与国家合一的体制，此时正在欧洲勃然兴起，而1500年以降的中国，国家体制的上中下结构却开始走向脱节，以至于国家的一切改革非但不能动员官吏，反而总是被庞大的官吏集团所阻碍，国家组织效率的严重下降，使得一切政治经济改革都不能真正实行。实际上，最终导致明王朝瓦解的，不但有皇权专制的原因，更有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阶级之颀顽独断，以及胥吏、豪民阶层控制地方。无能而颀顽的士大夫阶级为了一己之私，妄图以道学的专制垄断社会权力，这种“士大夫阶级的道学专制”，更促成了体制从内部的解体。而正是由此看来，钱穆的博学，恐怕也是士大夫一家的博学，因为在他那里，无论均田重农还是平等夷狄，这些都不算数，只要你不尊重“四民之首”的士大夫，那么你就是专制。而他所同情、追随的国民党，虽曾标榜、号称要继承中国政治制度的有益因素，如在美式“三权分立”之外，再加上中国式的“考试”与“监察”两院，以成为“五权”宪法，而这种精英运动的体制，又究竟是否行之有效，自然也早已被历史所证明。

不过，确如钱穆指出：民权的表达和实行不能单靠一纸宪法和几个代议士，关键在于形成下情上达的有效机制，他的这种看法倒是真有启示性的。而且，毫无疑问的是，诚然如他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悠久的文明，自然不能说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制度”而只有“专制”，例如所谓均田与兼并、科举与选举、郡县与封建的制度争论，实际上就一直贯穿于中国历史之中，并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改革与革命的真正动力。看不到这一点，自然也就不能说对中国的文明有起码的了解，那甚至就会沦为钱穆所讥讽的：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一再自食“改革的恶果”，尤其是老百姓一直不得不一再承担起“改革的后果与代价”，

这往往就与精英们没有知识和眼光，只会看见私利和短期利益最有关系。

而与钱穆比较起来，黄仁宇先生虽未从过政，毕竟吃过粮（古人只把“军粮”称为粮），因此，他的有些话恐怕还算是比较到家的。他说：“过去的中国百年史，过于重视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比如说，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他们本身对社会是一种外来异物（foreign body）。其领导人不乏高远的理想，而他们身后却无支持的选民（constituency），满腹经纶自然也无从化为具体方案，更何况渗入民间，所以一遇军阀逞凶，就无能为力，而他们在历史上的意义也因而消失。”<sup>①</sup>说到制度变革，孙中山以来的改革家们其实最终也都不得不认识到：这绝非立一纸宪草、推几个“民意代表”即可完成的便宜事，而这里的道理，就在于“变制度易，变社会难”（这一点鲁迅等“先觉者”其实早在辛亥之后就一直“无可措手”地痛感着）。因此，要从根本上变革社会，那就非要从基层做起、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做起、从土地制度做起不可；要真正变革社会，就非要找到、找准中国社会的真正主体不可。以为单靠几个“民意代表”的三寸不烂之舌即可变革中国，这不过就是黄口小儿式的政治幼稚。以至于有人说：500年来，中国最不成熟的就是上层和精英，而精英们最大的不成熟，就在于他们总是要咒骂下层民众“不成熟”——这实在是很有趣味的格言。

至于说到变革中国的主体，近代中国早期的改革者如康有为，曾寄望于作为“儒主”的皇帝的“公心”，这自然不能成功，而到了孙中山先生找到革命政党，这才算是初步找到了变革中国、特别是进行民族革命的抓手。但是，解决土地制度问题、训练和组织广大农民，从劳苦大众、从最基层出发改造长期为胥吏、豪民所把持的基层社会结构，这才是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中国完成民族革命，再领导中国走向社会改革与社会革命的关键。而倘若放弃了这一根本关键，汲汲于从上层、从书生们的狭小视角空谈所谓的“制度”和“技术”之优劣，无论是搞“三权分立”还是玩什么“五权宪法”，那就不仅是短视，而且是舍本逐末，而这种“瞎折腾”，终将自食“改革造成的恶果”，才是必然的事情。

时下人们恐怕都知道，近代以来，中国没有科学、工业、自由和民主是不行的，但是，如果离开组织劳苦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个中国社会主体，离开了改

<sup>①</sup>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第454页。